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2.004

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路径演进^①

张放

(上海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西方民众对毛泽东的认知源于革命时期新闻记者的报道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开启于冷战时期。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两种有影响力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历史——区域”路径,强调首先将毛泽东置于中国的历史语境和革命实践进程中考察;一种是“全球史——比较”路径,强调在世界范围内分析毛泽东的影响和价值,比较不同地区对毛泽东思想的应用。我们可吸收融合两种路径的长处,推动国内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进程。

关键词:西方毛泽东研究;历史——区域路径;全球史——比较路径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2-0019-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相当重视西方学术界对毛泽东的研究,引介了大量西方学者的研究著述,且不断有研究者撰文介绍西方毛泽东研究的最新状况,深入分析某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及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借鉴与批判。中国学者对西方毛泽东研究之进展已有相当了解,不过仍有可加强之处。例如,我们或习惯性地聚焦于毛泽东研究领域内部,或将毛泽东研究与对毛泽东时代的研究完全等同,相应地缺少将毛泽东研究置于西方区域研究的发展脉络中把握其演进历程的意识,这就有可能导致我们对于某些研究的学术史价值把握不足。基于此考量,本文将在西方中国学发展脉络中去梳理毛泽东研究路径的演进,并结合典型研究做出适当分析。

一 毛泽东进入西方视野:革命战争时期的记录与观察

斯诺(Edgar Snow)作为第一个深入采访毛泽东的西方记者,他向海外读者展现了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生动形象。在斯诺笔下,毛泽东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他

“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①。斯诺认为毛泽东天生精明,有着农民的质朴纯真,具有幽默感;他努力工作,博览群书,特别对哲学和历史有所研究;他在共产党内影响非常大,但却执意追求平等,“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②。毛泽东在根据地时期面对西方观察家所展现出的杰出形象,同样给其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在谈到与毛泽东的交往时,就称其难以忘怀这位领袖在根据地所赢得的崇高威望以及面对危局时的沉着神态^③。

在刻画毛泽东形象的同时,西方记者也会涉及毛泽东的所思所想。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刻意提到毛泽东作为理论家的身份,敏锐地意识到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根植于中国历史和军事实践之中,他可以游刃有余地从日常生活、中国历史以及经典著作中发掘出用以解释理论的鲜活案例。在史沫特莱看来,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里程碑”^④。斯诺借毛泽东之口,讲述了其早期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及在革命

① 收稿日期:2018-1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DJ02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2016M590374)

作者简介:张放(1984-),男,河南开封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①(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

②(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③(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马清槐、方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2-175页。

④(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江枫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

实践中对中共革命认识的变化。斯诺的这段实录,为之后中外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提供了基础性史料。白修德注意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要价值。他认为这篇文献是“无懈可击的,在很多方面都闪烁着光辉”^①,为共产党的行动提供了全面指导。但白修德坦言该文献留下了三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第一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持续时间的问题;第二是共产党如何面对受美国民主观影响的反对派;第三是美国将在共产党的对外联盟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白修德对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分析以及对中共革命形势的判断,在同时代的观察家中算得上深刻,他试图从感性观察走向理性分析,而他提出的问题,也为后来西方研究者的分析提供了“接着说”的空间。

新闻报道最初对毛泽东的呈现,虽然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记录者的主观情感和政治立场,且尚未达到严谨学术研究的层次,但意义不容小觑。首先,与后来的西方毛泽东研究者相比,这一阶段的观察者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以及共党政权,进而可以形成最为直观的认知。正如齐慕实(Timothy Cheek)所言,比起学术作品,这些报道在塑造西方民众对毛泽东和中国的认知观念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②。其次,这一阶段所产生的作品,其史料价值一直延续至今。近些年,尽管中国大陆出版的相关史料日益丰富,但西方学者在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毛泽东时,仍然反复引用这些融合历史语境的作品。再次,西方记者的报道塑造出了一个“革命者毛泽东”形象,这一形象不但构成了毛泽东世界影响的重要维度,同时还是“亲毛派”西方学者价值立场建立的基石。

二 开启学术化进程:历史学基础上的区域研究

1949年国民党兵退台湾,这对美国政学两界

来说,无疑都是沉重打击。一方面,二战结束之后,特别是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后,美国朝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之情逐步蔓延,“麦卡锡主义”迅速赢得舆论支持^③。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与历史上的“黄祸论”传统^④相融合,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愈加扭曲。另一方面,来自学术界的批评直击美国对华观念中深藏的理想主义浪漫迷思:近代以来,特别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在外人眼中主要以负面形象呈现,落后与愚昧无知成了西方评判中国的标签^⑤。而中国的这一形象正好给了自命代表文明发展趋向的美国教育家和慈善家施展国际主义抱负的契机^⑥。在乐观进步主义信念的驱使下,美国人按照自己对中国的想象作出判断并付诸行动,缺少从内部视角同情理解中国的自觉意识。例如,邹谠(Tsou Tang)就直言不讳地批评,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美国官员对共产主义普遍无知,且过低估计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⑦。

在政治困顿和学界批评的影响下,研究者开始从整体上反思之前对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基于感性基础之上的认知,学术层面的探索正式开启。

费正清主张,历史地研究毛泽东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应该首先注意其“中国特性”^⑧。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正是在这一传统下研究毛泽东的开山之作。史华慈利用当时能够获取的中文文献,历史地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各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生形式。通过对这些派生形式的详细考证,他认为能够判断共产主义学说中的哪些内容仍然指导着具体的行动,而哪些内容已经成为“失去生命力的赘词,用来掩饰学说的落败”^⑨。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即“将政党建立在纯粹的农民群众基础之上,依据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并通过马列主义基本教义的

①Theodore H. White,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p. 234.

②Timothy Cheek. *Mao, Revolution, and Memory*, Timothy Cheek ed.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8.

③(美)詹姆斯·柯比·马丁等:《美国史(下册)》,范道丰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79-1183页。

④罗福惠:《非常的东西文化碰撞:近代中国人对“黄祸论”及人种学的回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引言第5页。

⑤(美)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高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⑥樊书华:《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人文学科的再建:1924-1951》,方堃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⑦(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页。

⑧(美)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阎亚婷、熊文霞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67页。

⑨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4.

信仰而保持活力”^①。“毛主义”概念的提出,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真正的理论起点”^②。这一概念无疑表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思考不是对正统马列主义的简单复制,而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做出的调适性选择,理解毛泽东及其思想,首先要从中国语境出发。由此,毛泽东研究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区域研究的范畴。

将毛泽东置于区域研究的视野下做出历史分析,强调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传统思维和具体情景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这一路径对后来的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影响深远。著名学者施拉姆(Stuart R. Schram)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就力图将毛泽东思想置于历史过程中进行客观呈现,使思想和历史达到契合,并强调与正统马列主义之间的差异性^③。而由施拉姆主持编辑的重要史料集《通往权力之路》(*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则试图详尽收录毛泽东发表于1949年之前的原始文献,以编年形式呈现,方便研究者掌握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施拉姆去世后,这套文献的编纂工作并未停止,持续至今。该文献充分体现了历史——区域路径的研究取向和基本方法。

在战后完成系统中国学训练的新一代学者,更普遍地接受了历史——区域路径的毛泽东研究范式。例如,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在解释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时,用了大量篇幅讨论中国传统思想,试图在传统思想与毛泽东的话语之间寻找一种关联^④。朱东成(Don-chean Chu)在研究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观时,将毛泽东对教育的基本看法放在中国传统、近代历史和毛泽东的实践经历所共同构成的语境网络中进行解读^⑤。沃马克(Brantly Womack)在研究毛泽东的早期政治思想时,坦言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考察毛泽东著作的实践基础和它们的政治背景,以期

在活的有机体中”历史地进行分析^⑥。他同时强调中国的政治传统对理解毛泽东思想创新性的重要性。

历史传统和区域视角下的毛泽东研究在毛泽东去世后出现了新变化。毛泽东在世时,西方学者在认识解读中国时,往往将毛泽东视为“绝对至关重要”的人物,而容易忽略其他角色或因素。毛泽东去世后,西方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拓宽,开始关注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民众是如何受到毛泽东思想和政策的塑造^⑦。1980年代末,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⑧出版,对西方中国学研究者触动很大。文集中关于仪式、身体以及阅读史的研究,让中国学研究者认识到透过“权力——文化”视角理解毛泽东时代以及毛泽东影响的可能性。1990年代,中国大陆各级档案馆陆续开放了毛泽东时代的档案,这使西方学者有机会从社会史路径深入研究^⑨。经过了文化——社会史转向之后,历史——区域路径下关注毛泽东思想——实践的研究传统有式微之势,研究“毛泽东的影响”的著述开始涌现。例如洪长泰(Chang-tai Hung)对毛泽东时代政治文化塑造的研究^⑩以及里斯(Daniel Leese)对毛泽东崇拜现象的研究^⑪,都体现出文化——社会史视野的影响——他们充分利用档案材料和民间史料,关注政治仪式、建筑景观、文艺形式、语言修辞及日常阅读,着重分析普通民众精神世界的建构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文化——社会史转向拓宽了传统毛泽东研究的视野,但基本旨趣仍在历史——区域路径范畴之内,其对基础史料和中国语境的强调,进一步巩固了历史——区域路径。

总体而言,以史学训练为基础的区域研究,将毛泽东首先置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编织的意义之网中进行解读,有效推进了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进

①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189.

② 萧延中等编著:《“传说”的传说》,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579页。

③ (美)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9-11页。

④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28-93.

⑤ Don-chean Chu. *Chairman Mao: Educ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80, p.ix-x.

⑥ (美)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霍伟岸、刘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⑦ Timothy Cheek. *Mao, Revolution, and Memory*, Timothy Cheek ed.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7.

⑧ Lynn Hunt.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⑨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97, pp. 5-6.

⑩ Chang-tai Hung. *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⑪ Daniel Leese. *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程。这一阶段的研究,澄清了很多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传言,呈现出在学术脉络中研究毛泽东的可能性。然而,这一研究取向和基本观点从开始便不断受到质疑。例如,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对史华慈的批评^①。这一批评尽管不排除可能存在的政治动机,但确实激发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研究路径的定位之争——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到底孰重孰轻? 1976年,围绕这一问题《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组织了一次笔谈,但结果依旧是分歧多于共识^②。进入1980年代之后,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认识毛泽东的西方学者尽管数量有限,但也不断发声,并针对历史——区域路径下的毛泽东研究路径提出直接批评。不过,历史——区域路径下的毛泽东研究具有更大影响,业已辐射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在其名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中指出,毛泽东的“创造性在于他对列宁策略方案的修正”,其“创造性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农民倾向性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③。而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认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着意突出对人性和道德因素的重视,毛泽东更加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④。

三 全球关怀与比较视野: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内部超越

历史——区域路径的毛泽东研究,从1960年代开始,在新一代学者的推动下有所开拓,并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探索路径。1960年代深刻影响了世界精神气质的整体性塑造,“反抗正统”成为理解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正如科兰斯基(Mark Kurlansky)所言,“那时各个国家和文化仍相互独立、形神迥异……然而却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了反叛精神的自燃”^⑤。二战后西方大学迅速扩招,为1960年代的反抗提供了主力军^⑥。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目睹民权运动的困顿、美

国对越南的非正义入侵,深深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裂痕^⑦。他们迫切地渴求可代替性思想资源以解决西方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而中国在此时进入了年轻人的视线。1958年《北京周报》创刊,中国官方的对外宣传提升到一个新阶段。通过刊登毛泽东对国际局势的各种评论与声明,以及他与外宾交谈中国革命经验的对话,《北京周报》向全世界建构了一个“正义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形象^⑧。当时西方大学的图书馆一般都征订了《北京周报》,青年学生通过对该刊以及其它材料的阅读,对中国充满了美好向往。加之苏联官方对斯大林问题的披露,许多西方左翼青年也将社会主义振兴的希望转移到了中国^⑨。

“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诸多观点迅速引起西方研究者的关注。他们透过令人困惑的表象,发现毛泽东与西方思想史中的某些思想家具有共鸣,相近的关怀和问题意识使得东西思想之间存在对话的可能性。例如,史华慈通过“公意”的概念,将毛泽东与卢梭和雅各宾学派联系在了一起^⑩。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从思想史角度探索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因时,也援引康德、卢梭等诸多西方思想家进行比较分析^⑪。既然毛泽东与西方思想界存在相似、共通之处,那么进一步推论,毛泽东思想也可能对缘起于他者语境中的困惑产生影响。学术上的推断亦被现实所证明:“文革”爆发后,世界各地掀起的“毛泽东热”让西方学者印象深刻,毛泽东思想在他者语境中的运用已无需质疑。透过“文革”对毛泽东研究进行反思的西方学者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所具有的超越地区的影响力。毛泽东去世之后,威尔逊(Dick Wilson)在其主编的为毛泽东历史地地位下“定论”的文集导论中坦言,毛泽东是现代第一个不涉及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去讨论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追求正义的人,他“不但颠覆了中国精

①Karl A. Wittfogel.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1960, 1 (Jan. - Mar.): 72-86.

②路克利:《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159页。

③(波兰)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3卷)》,侯一麟、张玲霞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80页。

④(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243页。

⑤(美)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向世界之年》,洪兵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⑥(美)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第2卷)》,林骧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24页。

⑦(美)乔治·布朗·廷德尔等:《美国史(第4卷)》,宫齐等译,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6-1045页。

⑧张放:《〈北京周报〉的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8期。

⑨(美)托尼·朱特,蒂莫西·斯奈德:《思虑20世纪》,苏光恩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63页。

⑩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pp.177-180.

⑪(美)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3页。

神隔离的神话,也颠覆了西方在道德和知识领域的垄断,同时还颠覆了工业国家那至高无上的地位”^①。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主动开启现代化征程。这一发展战略的选择,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对毛泽东时代的思想和实践价值的再挖掘成为部分学者的选择。1980年代初,世界著名左翼学者阿明(Samir Amin)就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对第三世界的意义,并在世界革命的视阈下重新审视了毛泽东主义的价值^②。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势如破竹的发展趋势使得西方左翼学者进一步将目光对准毛泽东,希望通过对毛泽东思想价值的进一步挖掘,来丰富对抗资本主义的理论资源^③。而来自历史学界内部的反思也使学者试图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例外论史学”,进而将目光对准一些跨国历史现象^④。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一种倡导“交流、联结、混合”的全球史观正在兴起^⑤。此时关注毛泽东的西方学者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学范畴,出于对全球性问题的焦虑以及对毛泽东具有超越中国区域之意义的肯定,不同学科、不同研究专长的学者纷纷将目光对准毛泽东。

1997年,以德里克(Arif Dirlik)为首的左翼学者出版论文集《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公开批评中国学者对毛泽东解释权的长期垄断,宣称语言不应成为毛泽东研究的天然屏障,应以跨学科的“批判性左翼视角”介入毛泽东研究,进而评估毛泽东思想的全球影响^⑥。这本论文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部分西方学者对历史——区域路径下的毛泽东研究范式不满的集中爆发。该论文集第二部分收录了五篇文章,讨论了毛泽东在秘鲁、越南、印度、菲律宾和日本的影响。论文作者分别致力于这五个国家的研究,未必通晓中文。他们集中探讨的核心问题乃是毛泽东思想如何影响这些国家的左翼政治与文化运动,以及不同地区的知识精英是为何被毛泽东所

吸引。这五篇文章放在一起又形成一种对照,以此观察毛泽东思想应用于不同地区时的经验和教训。研究者通过实践证明,全球史——比较研究路径何以拓展和深化历史——区域路径的毛泽东研究范式。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史——比较研究路径继续深化。从事哲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聚焦西方知识分子与毛泽东的关系,如波伏娃、阿尔都塞、巴迪欧的毛泽东情结陆续被关注。沃林(Richard Wolin)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系统。他认为法国知识分子在毛泽东那里挖掘到一种创造性方法,可以用来解决法国的政治保守主义。通过与毛泽东相遇,他们告别了对专制主义政治模式的迷恋。在毛泽东思想的启发下,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争夺政治权力的目标,反而“试图在习俗、习惯、性征、性别角色和一般社会交往中发起一场民主革命”^⑦。历史学者则更关注毛泽东对不同地区政治实践和文化的影响。2014年库克(Alexander C. Cook)主编的《毛主席语录:一部全球史》^⑧出版,该书的15位作者集中讨论了《毛主席语录》在中国、印度、坦桑尼亚、苏联、阿尔巴尼亚、美国、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以及东西德的传播与接受过程,讨论覆盖了共产主义阵营、欧美发达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全球史——比较研究路径的兴起,同样对毛泽东研究的传统范式产生影响。例如,柯瑞佳(Rebecca E. Karl)对在孤立封闭的中国语境中理解毛泽东的区域研究传统提出批评,称毛泽东之于中国的意义亦须置于“披上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外衣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去理解^⑨。

四 结语

从新闻记者通过实地考察,将毛泽东的形象和思想传播给海外受众开始,毛泽东正式进入西方视野,为人所知晓。西方学术界对毛泽东的研究真正开启于冷战时期,先后产生了两种有影响力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历史——区域研究,一种是

①(美)迪克·威尔逊主编:《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王伟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②Samir Amin. *The Future of Mao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1, pp.107-146.

③Fredric Jameson. *Periodizing the 60s*, *Social Text*, 1984, 9/10 (Spring-Summer): 178-209.

④王希,卢汉超,姚平主编:《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14-15页。

⑤(日)入江昭:《我们生活的时代》,王勇萍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0页。

⑥(美)阿里夫·德里克等主编:《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张放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7页。

⑦(美)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董树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⑧Alexander C. Cook ed.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⑨(美)瑞贝卡·卡尔:《毛泽东传》,龚格格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全球史—比较研究。前者强调将毛泽东置于中国传统与历史语境之中进行考察,以突出毛泽东身上的“中国性”特征;后者希望将毛泽东置于全球历史进程中进行透视,以挖掘毛泽东的世界影响与超越中国区域的价值和意义。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成果与相关争论,若将其放在两种路径的演进脉络中进行理解,其学术史意义将更加清晰^①。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研究路径并未构成一种此消彼长的代替性关系,也不存在孰优孰劣的争执。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之间恰可以相互补充,共同促进毛泽东研究。历史——区域路径的优势在于对不同类型史料的收集与解读,这恐怕是毛泽东学术研究的基础。不过,如果将这一路径推向极致,研究者往往就容易忽略甚至贬低中国因素之外的其他影响,而这些因素可能正是以一种隐匿的方式与中国语境相融合,并发挥作

用。全球史——比较路径的研究,其长处乃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透视研究对象,并更为平等地对待可能影响研究对象的诸因素。但由于从事该研究的学者来自不同学科,接受不同训练,对中国的历史语境和基础材料未必熟悉,因此可能在解读过程中出现各种错漏,甚至存在忽略语境的倾向。因此,我们面对西方的研究,应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与之对话,既不可妄自菲薄,亦不必妄自尊大。事实上,中国的毛泽东研究者更有可能结合两种路径,发挥我们的研究长处,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革命历史进程以及与毛泽东相关的基础史料文献的掌握和解读无疑更具优势,如若能一方面从区域——历史路径中吸收不同于中国学术传统的治史视角,另一方面从全球史——比较路径中汲取着眼世界的问题意识和基本关怀,打破视野局限,那么必定有助于推动当下中国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进程。

The Approaches Evolution on Western Studies of Mao Zedong

ZHANG Fa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The Western public's impressions of Mao Zedong originated from the news reports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while the academic researches of Mao Zedong emerged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There are two main approaches in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Western Mao studies. One is historical analysis-area studies approach, which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revolutionary praxis in interpreting Mao. The other is global history-comparison approach, which emphasizes that Mao's influences and values should be analyzed universally and stresses the primacy of comparative studies. We could combine the advantages of these two approaches and develop the domestic Mao studies academically.

Key words: Western studies of Mao Zedong; historical analysis-area studies approach; global history-comparison approach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刘洪森:《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三个视角》,《毛泽东研究》2018年第4期。